

书

友

俗 轻 集

唐振常



文

丛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友

书

唐振常

俗
轻
集

文丛主编 倪墨炎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文

丛

(沪)新登字 118 号

责任编辑：王树荣

装帧设计：陶雪华

俗 轻 集

唐振常 著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新华路 200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75 字数 180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册

ISBN 7-5432-0293-X/I·58

定价：14.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厂质量科联系。T：56628900×13

总 序

我们深信：开卷有益。

我们深信：读书可以怡然自娱。

因此，我们愿意提倡读书，愿意在书界打杂，愿意编辑出版这套丛书。

现代生活节奏的日益加紧，使人们更关心休闲的生活，要求提高休闲的质量。休闲本来是各有所爱、各得其所的事。看电影，守荧屏，兜马路，逛商场，上公园，走亲访友，围打扑克，三五知己相聚喝茶，黑白子斗智，保球强身，都无不可。当然，也可以在卧室兼书房的斗室里，或在书斋里，坐拥书城，自得其乐。如能邀集志趣相投的四方，在书斋里高谈阔论，交流阅读见解，更是高雅而赏心的乐事。

在休闲的时间里，人们大都喜欢读短小的文字，这或许是近年小品散文走俏的原因之一。读书随笔是小品散文的一种，是一种较自由的文体，可容的内容也比较广阔。它可以写人书事，可以侧重写人，可以侧重写事，也可以侧重写书；它可以是读书札记，诸如史料考证，版本书话，钩沉辑佚，掌故琐记，乃至一段古文的释义，一条注文的纠错，一篇庸品的辨伪，都无所不可；它也可以是读书随想，可以接近于书评，也可以接近于鉴赏，也可以接近于创作谈，乃至接近社会文化现象的短论。至于写作谋篇，更无拘束，既可以是文章，也可以是日记、书信、访谈记录；

既可以笔致凝重,也可以下笔轻松,既可以生动活泼,也可以严肃老到;既可以絮絮如谈家常,也可机智而妙语连珠。

我们不大赞成把读书分成求知和求趣两类,好像一种是为“致用”而读书,一种是为“趣味”而读书。其实,在读书生活中,常常是求知中得趣,自娱中得识,两者总是相辅相成,不大可能分离而对立。我们也不赞成指定某种书“你一定要读”,如有异议,就唠唠叨叨地讥笑人家不懂“书趣”。其实,真正该被讥笑的是谁呢?读书本来就是见仁见智、各行其道的事,何必强人所不愿?人家爱吃蹄髈,你非让人吃排骨,岂非傻事!

本丛书所辑内容广阔甚或驳杂,写法多样且各有风格,但各书也有共性,那就都是读书随笔或准读书随笔。我们相信:它们会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我们——参与编辑、出版本丛书的同志们,是爱书的一群。我们愿意以书为友。我们愿意为书的事业竭尽绵力!

主 编

1996年夏于沪西

集 前 小 引

司马迁说他的职业——史官是“倡优所蓄，流俗之所轻也”，这已经不止于自谦，而是自污了。遭受了奇耻大辱的宫刑，作此自污之词，其心可解，其情可悯。史家并非就是史官，今天的历史学者可以勉强称为史官的，应为性质近于国史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诸公。这个职业自然不是“倡优所蓄，流俗之所轻”。然史家所业与史官所事毕竟皆为治史，历史上的史家、史官不得好下场者并非鲜见；当代的“文化大革命”自批判《海瑞罢官》始，以此相况，以史学或谈史、讲史视为“流俗所轻”之业，似亦在可以理解之中。如果再联系到曾经有过“历史有什么用”的说法，更可见确是“流俗所轻”了。

此集非史学之作，不过颇有谈史之文，要皆不入正规，无非野狐说禅，连同其他与史无关的集中文字，皆不能登大雅之堂奥，自然为“流俗所轻”。因以“俗轻”为本集之名，并非自谦，乃述其实。

一九九八年四月七日

目 录

集前小引·····	(1)
纵贯横通论晚清·····	(1)
——石泉《甲午战前三十年间晚清政局概观》书后	
百年沧桑说戊戌·····	(7)
五老七贤·····	(12)
蔡元培之大·····	(17)
北大能容蔡元培否·····	(20)
周孝怀先生·····	(23)
与梁启超无涉·····	(27)
新屋故室·····	(31)
四川军阀杂说·····	(33)
中华文化最关情·····	(66)
——贺《明报》纽约版创刊	
君子可欺以其方 难罔以非其道·····	(68)
——斥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之诬	
《傅斯年全集》·····	(88)
“选集”小议·····	(92)
编辑和作者·····	(97)
——从两本书想到的	

2 书友文丛·俗轻集

记者·史官·史家	(100)
长水悠悠但求真	(103)
《陈原散文》赞	(107)
补史之阙	(109)
——读《李辉文集》想到的	
历史不容篡改	(111)
《金山县志》读后	(114)
 黎东方先生讲史之学	(117)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序	
《中国文化之谜》第四辑序	(122)
独辟蹊径创新境	(130)
——序《乡土童年——回忆消逝的中国传统》	
《海上风情——上海百年变迁录》序	(132)
《文化上海》的古典与今意	(136)
——李天纲《文化上海》序	
光荣增斗志 屈辱励雄心	(139)
——《外滩》画册序	
 张东荪先生记微	(142)
五十二年前一册页	(146)
豁达大度谢文炳先生	(149)
蔼然长者张琴南先生	(155)
怀念蒋荫恩先生	(160)
记沈体兰先生	(167)
我泪欲干哭黎澍	(175)
闻陈凡逝	(180)

忆庆澍	(183)
—— 兼怀同学诸少年	
追念刘芑如	(190)
一代报才刘克林	(196)
风雨同舟忆《文萃》	(203)
香港缘	(216)
高楼悄悄盖起	(222)
真假大减价	(225)
南丫之行	(227)
旧邦新命	(229)
—— 为楼外楼一百五十周年作	
说长道短	(231)

纵贯横通论晚清

——石泉《甲午战前三十年间
晚清政局概观》书后

甲午一战，败于蕞尔岛国之日本，败得是那样的惨，自是年六月廿三日（公历7月25日）接战，至年底，日军连陷九连城、金州、旅大、盖平，中国军队几无回手之力。翌年乙未三月二十三日（公历4月17日），签订了丧权辱国至极的《马关条约》。同年五月（公历6月），日军入侵台湾。自此，帝国主义者更为大胆无忌地入侵中国。甲午一役，对于中国朝野的震动，可谓空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国真的该亡吗？中国人在担心，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思索，寻找变局。中国的历史曲折以前进。

一代先进知识分子挺身求变。甲午五月中下旬，距战争爆发不到一月，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言改革，未被采纳，决心革命，于甲午败势已定之十月廿七日，创兴中会于檀香山，《马关条约》签订后，孙中山筹备起义工作更加积极。《马关条约》签后之四月初八日（公历5月2日），康有为振臂一呼，联合各省在京应试举子一千三百余人“公车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章太炎毅然走出书斋，参加强学会，编撰《时务报》、《实学报》和《译书公报》，开始言革命。翰林公蔡元培，开始改变沿袭的旧学道路，探索救国之道，始言西学。翰林公张元济，亦夫学英文，求西

学,与友好同办通艺学堂。……

于时,体用之争,本末之辩,发都下而传全国,中西两大文化冲突之所演绎,赫然进入于新阶段,于是而有戊戌维新,而有六君子之血染菜市口,而有革命形势之大发展。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应验以生,而其所生所变,则远远超乎李鸿章所意味的内容与形式。遂亦可知,甲午一战之败,关系中国前途之至深至巨也。明乎此,则可见石泉《甲午战前三十年间晚清政局概观》一文之作之深意焉。

按石泉此文作于五十年前,时就学燕京大学研究院,系在陈寅恪先生指导下完成的硕士论文。就所知,石泉当为寅恪先生亲任指导完成中国近代史专业硕士论文写作之第一人,甚而是唯一之一人。据石泉自述,远在一九四四年冬季,侍寅恪先生目疾,先生问及毕业论文拟作何题。石泉因答拟就甲午战争惨败之内政背景进行探索,意在阐明中日几乎同时仿效西方,何以甲午成败判然,而国际局势、国内政局皆因之发生重大变化,下启我国此后更为动荡之历史新阶段。此题得蒙寅恪先生首肯,并告石泉曰:“其实我对晚清历史一直是很注意的,不过我自己不能作这方面的研究。认真作,就容易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作。你想要作,我可以指导你。”于是,石泉即在先生指导下搜集材料,进行写作。每一成节,即读与先生听,然后详细讨论定稿。至一九四八年夏完成。

所以详引石泉自述写作经过如上,则由于寅恪先生晚岁记叙家世父祖三代所经历之晚清政局之作《寒柳堂记梦》未定稿》既多散佚,而石泉论文所据史实及在此基础上形成之对当时政局的评论,颇多得自先生之启迪与诲正,是以读石泉之文,或可稍补未能得睹先生全稿之憾于万一。此石泉之作乃更足可珍矣。

石泉论文题作《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未曾发表。今兹在全书出版之前，先以其第一章《甲午战前三十年间晚清政局概观》发表于《燕京学报》新二号。本文即就此立论，略述读后之感。

同治一朝，号称中兴。其时，太平天国底定，东捻、西捻相继平服，左宗棠更荡平西北，勒马天山，盖由湘、淮军力之盛，选练制兵之成，亦夫洋务建设之功，而以文人出身统御军事之将帅，自曾、左、李以下，一时人才称盛，亦其因也。然洋务运动，自始即有其失，李鸿章于同治三年致恭亲王奕訢及军机大臣文祥书云：“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制器；欲学外国制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蒋廷黻以为这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有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实则，只着眼于器、艺、才，正是李鸿章见识不足之处。他在同治四年八月改建江南制造局奏折中说：“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獠狃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于是，李鸿章之所欲学西方者，只是其长技而已。早在甲午以前，有识之士如郭嵩燾，专函李鸿章，指陈洋务之失，主张派留学生出洋学习制造和驾驶，不如学科学技术。更好的办法，应是像日本一样，在国外学习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立国之本。李鸿章见不及此，而答以“鄙人职在主兵，亦不得不考求兵法”。“兵乃立国之要端，欲舍此别图大者远者，亦断不得一行其志。”这就是梁启超批评李鸿章“惟知练兵而不知有兵之本源”。由此可知，洋务运动从一开始提出，即过于重长技，重军事，重科技，不揣其本，只求其末，其所培养的人才，曰洋务官僚，或称为科技官僚是也，虽能济事于一时，毕竟不能图长远。是以经之营之三十年，至甲午一败，乃不可收拾，而

宣告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焉。然虽经此败，国人犹有效李鸿章之余风者，是以时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雨僧日记》记陈寅恪先生与吴雨僧先生哈佛夜谈，慨叹当时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谓为“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则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陈先生并断然曰：“今人误为中国过重虚理，专谋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谋精神救药，势必至于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寅恪先生此言，亦可视为对洋务运动间接之批评。

洋务运动既以见识之限，不能为掘地见根之革新，而海军建设费用，在光绪十四年以后，因移以营造颐和园而大减，又复屡受制于李鸿章的老对头，掌管户部之翁同龢，更不能不情见势绌。李鸿章于光绪八年，与署直隶总督张树声合奏，分析中日双方兵船的力量，认为是互不相让，进而说：“然比年以来，臣鸿章与内外诸臣熟商御侮之要，力整武备，虽限于财力，格于浮议，而购船制械，选将练兵，随时设法，独具规模。”结语说：“中国地大物博，能合力以图之，持久以困之，不患不操胜算。”“中国战舰足用，统驳得人，则日本自服，球案（按指日人侵琉球）亦易结矣。”李鸿章这时对胜利前景的信心，并非无据，光绪十四年以前，中国海军较日本为有优势。及十四年以后的情势，如甲午战启时李鸿章所奏：“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购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启奏湊请，臣当躬任其咎。”六年之期，海军未扩，至光绪二十年战启，日本海军已强于中国了。

李鸿章对此是明白的。他分析北洋海军之可用者，只镇远、定远两舰优于日本，然“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汊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甲穹甲，而行驶不远。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仅十

五、六海里。此外各船，愈旧愈缓。”因此，尽管是时业已战启，李鸿章制定的政策是“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以求谅于局外也”。李鸿章之不主战明矣。然而，毕竟还是战了。李鸿章以局内人明白不能战，尽管他没有公言反战，已招来了汉奸之谤，“杨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流行舞台，盛传都下，李鸿章毕竟也爱名节，于是在和战之间流之于依违两可。此所以陈宝箴在时流中独具只眼，于战败后责备李鸿章曰：“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畏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凭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其世所蔽罪李公，吾盖未暇为李公罪矣。”（陈三立《府君行状》）

抄引拙作旧文一段（《再说李鸿章》，载《川上集》）如次：“一时主战之风甚嚣尘上，且说动了慈禧和光绪，李鸿章在奏折中才作此表示（“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中国屡受敌侵，朝野有轻易求战之心，其情可谅；在不能战之时而强战，乃以国家事为儿戏，其事不可取。远一点说，南宋以来，即因辽金元之屡侵，就造成了轻易言战的心理，士大夫以功名自见者，动辄言战，后人之误以为不问任何情况，言战即同于爱国，因而往往以战和判忠奸，其误甚矣。即在近代，甲午以前，已有鸦片、英法联军、中法三役之败，不检讨自己，审时度势，力求自强，锐意改革，只是空口叫战，只能败得更惨。可悲的是，甲午惨败诚然深深震动了中国，尤其知识阶层，戊戌维新以起，革命之说以兴，当政者则还是昏聩糊涂，最后引来了愚昧无知的义和团，招致了八国联军入侵。”

李鸿章非欲战，而终于不得不战者，即由上述轻易言战之心理，引发了以李鸿藻为首的清流党人、帝师翁同龢等主战派之群力促成之也。清流党人为局外人，局外人危言高论，立异以为

高，说来轻松，造成风气，再加以宫廷矛盾，朝臣党争，终于不当战而战，遂使经营三十年之自强运动归于失败矣。凡此等等，《甲午战前三十年间晚清政局概观》均有所论，条分缕析，上探其因，下论其果，左右兼及，横通并列，一事标而诸事明，诸事举而一事彰，论史之文，于斯至矣。吾于此三读之而致赞焉。

抑更有言者，石泉此文作于五十年前，一可见其独立无羁之思想，了无顾忌，言人之所未言，发人所未发之覆，毫无左顾右盼之拘束，此正得寅恪先生平生所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真谛，吾于此更尊其为同门学长也。二从文字言，挥洒自如，得心应手，语语照应，前后关联，以视后之八股之风，高出不知多少。今之治史者，于此亦当有以学之。

既服其识，又佩其文，谨为书后如上，不尽欲言之于万一也。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写于沪滨半拙斋

百年沧桑说戊戌

百日维新，何其短暂！然而，这短暂的百日，却铸就了历史的长远。设想当年，诏书连下，奏章飞上，士人争向西方寻求借鉴，人民仰首祈望变革，一时之间，这沉睡了二百多年的帝国，似乎觉醒了，尽管并没有很多的改革实际行动，毕竟咆啸之势已成，奔腾即将跃起。历史充满了希望。无何，转瞬之间，光绪皇帝软禁瀛台，六君子血染菜市口，康梁亡命海外，陈宝箴革职永不叙用，新政尽废。新政可以废于一时，历史开回了倒车，但是，维新的思想不灭，历史的希望永在，人心思变，这是怎么样的倒车也阻挡不了的。试看后来由清政府颁布实行的清末新政，远远超过了它当年所禁止的内容，证明了嘲弄历史者终被历史所嘲弄。然而，时间来不及了，社会解体，清朝政府一命呜呼。历史沿着另一个指向前进。

要说戊戌维新，得看历史发展之由来。历史事件发生于此时，溯其本源，有以致之。甲午之役，败于蕞尔岛国日本，李鸿章辛苦经营十年的北洋水军毁于一旦，陆师则湘、淮、毅、盛皆不足恃，连遭败绩，国亡无日，朝野震动。乙未签订马关条约，丧权辱国，民愤已极。于是，一批批知识分子以不同的方式走上求变之道。康有为联合在京应试举人数度上书倡变法，章太炎走出书斋，开始言变法维新，蔡元培始求西学，探维新之道。而是时（丁酉，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次年（戊戌）各国

继之，俄占旅大，法占广州湾，英占威海，大有瓜分中国之势，国事更危。是年春为会试之期，各省举人相继入京，康有为等成立保国会，参加者达数百人，声势大过于前此在京成立的粤学会、闽学会、关学会、蜀学会等。保国会成立之后，地方性的保滇会、保浙会等，亦相继以起，一时声势大张。这种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结社集会的方式，使爱国求变的呼声大盛。正在此时，多次阻止光绪召见康有为的恭亲王奕訢死，康有为等促于下，翁同龢谋于上，于是而有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定国是之诏下。百日维新从此开始。

百日期间京中维新经过，论者多矣。除此，不应忽略湖南地方的维新措施。早在乙未（1895年）陈宝箴任湖南巡抚起，即力办新政，而丁酉（1897年）梁启超偕其康门同学数人应邀入湘主讲时务学堂，带去了更多的新学。湖南是经历了新政实践的。据陈三立《巡抚先府君行状》所述，陈宝箴在湖南为政之大要“在董吏治，辟利源；其大者在变士习，开民智，饬军政，公官权。”其具体施为是，“既设矿务局，别其目曰官办，商办，官商合办；又设官钱局，铸钱局，铸洋元局，……又通电竿，接鄂至湘潭，……而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南学会，武备学堂，制造公司之属，以次毕设。又设保卫局，附迁善所，……又属黄君（遵宪）改设课吏馆，草定章程。又选取赴日本学校生五十人，待发。其他蚕桑局，工商局，水利公司，轮舟公司，以及丈勘沅江涨地数十万亩，皆已萌芽发其端。由是规模粗定。当是时，江君标为学政，徐君仁铸继之，黄君遵宪来任盐法道，署按察使，皆以变法开新治为己任。其士绅负才有志意者，复慷慨奋发，迭起相应和，风气几大变。湖南之治称天下，而谣诼首祸亦始此。”

以上引录稍多，藉以明湖南新政之内容及实效。而陈三立助其父办新政，所言自确切可信。于此，可知陈宝箴是躬行实践